

# 书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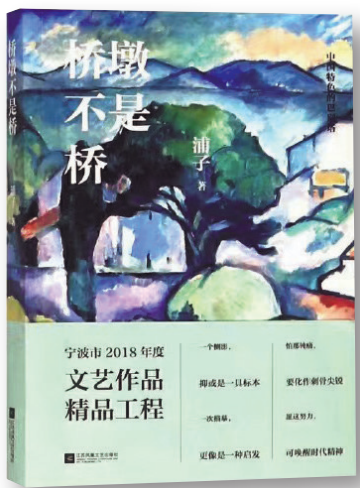


## 书香茶座

潘凯雄

### 一个混沌的世界

潘凯雄



从题材上看,《桥墩不是桥》当归属于乡土。许多学者都认为:中国新文学以来乡土文学创作的经验是比较丰厚的,相对而言则是我们都市文学、都市题材的创作要弱一点。如果这样一种描述大体符合实际的话,那么,浦子在创作这部名为《桥墩不是桥》的长篇小说时其实还是充满了挑战。因为他要面对的是前人留下的比较厚实创作传统,许多东西都能在过往的乡土文学作品中找到它的“气息”。但可贵的是,尽管如此,浦子在《桥墩不是桥》中所表现出的新鲜气息,以及从他那叙述看似混沌中所体现的价值和人物塑造等方面,依然呈现出一种出色、显出个性的长篇小说。

首先,作品所呈现出的新鲜气息令人眼前一亮。这是一种令人想说但一时又说不清楚的东西,还处在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确处于一种十分混杂的状态:一方面,伴随着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我们传承了数千年的乡村文化以及乡村的现状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和走向现代化国家进程中的其他变化又可能还存有种种差异,有强烈而鲜明的中国烙印、很典型的中国特色。所以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当中,中国乡村的现代化和乡村治理如何等,实际上是关系到整个中国社会能否走向现代化非常重要的一环。如果这一环走得不好,必将影响整个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浦子的《桥墩不是桥》实际上就是在中国社会正处于这种大背景下出现的。这样的立意,无论对作者还是读者而言其实都是有挑战的。

其次,作品所表现的那个混沌世界实际上体现了一种价值。在我阅读这部作品的过程中,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我一直不太容易理得清楚。故事似乎都看得明白:三任村主任是三代人,基本上属于三种类型,同一座桥修了八年。这里既有很洋气、很解放的女性薛家丽,有学者型的人物薛敏,还有从旧时代沿袭下来的老一代、老二代的农民。这些人物在当下这个舞台上的各种行为,暴露出来的问题是什么?又想说明什么?这些问题都很很一下子理得特别清晰。即便是这样,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倒是那些貌似把中国当下乡村说得十分清楚的作品,其真实性反倒有点可疑。这可能就是当下这样一种一时还理不清的、各种力量和价值观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的现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作品给我们真切地提供了中国某个地区乡村现实生活的的一个样本,这本身就是它的一个价值。

其三,作品的人物塑造总体上是成功的。在这个场景中活跃着的一些人物,他们的形象、性格及其行为,总体来说特征还是比较鲜明的,当然有个别的或许可以说“鲜明”得过了点。但无论如何,三任村主任、两位女性,还有上一代薛家、王家的几个人物,都给我们留下了较深的印记,也值得我们去细想。一部长篇小说的人物形象能把读者带入这种思考,本身就是一种价值。所以,这部作品无论从社会学意义上讲,还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等方面,都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此外,整部作品的生活气息、地方色彩也十分浓郁,透过这些文字,我们完全能够想象出那些场景,这也是作者写作的功夫。在这些意义上,说《桥墩不是桥》是一部特色鲜明的长篇小说并不过分。

与此同时,这部作品也有我个人感觉略显别扭的地方。作者在表现薛家丽与三任村主任的关系时,对其尺度的把握及自身逻辑的合理性方面处理得比较随意,个别处甚至还有点失之于轻佻,这恐怕是作者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本文系根据作者在《桥墩不是桥》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 贾大山小说的美学意味

——为纪念著名作家贾大山诞辰80周年而作 □袁学骏

贾大山的名字是响亮的。他1942年9月9日出生于河北正定城内,16岁开始在窑场上当临时工,1964年响应上级号召到正定县西慈亭村下乡插队。1971年调到文化馆从事文艺创作。1978年他的小说《取经》荣获首届全国短篇小说奖,从此名声大振。1982至1985年,习近平同志在正定任职期间,和贾大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97年2月20日,贾大山因病去世,享年仅54岁。徐光耀、铁凝、蒋子龙、陈世旭等作家纷纷撰文怀念之。远在福建的习近平同志满怀深情地写下了《忆大山》一文,高度评价贾大山具有“光明磊落、襟怀坦荡、真挚热情、善良正直的品格”,读他的小说“常常被他那诙谐幽默的语言,富有哲理的辨析、真实优美的描述和精巧独特的构思所折服”。在2014年10月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到贾大山“也是一位热爱人民的作家……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忧国忧民情怀,‘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今天,在贾大山诞辰80周年之际,本文拟从审美角度粗略地谈谈对贾大山小说的阅读感受,以示纪念。

### 始终表现农村生活之美

铁凝在1989年《山不在高——贾大山印象》一文中说,贾大山兴许是唯一一只写农村的短篇的作家。这是因为贾大山是由农村(包括县城)生活的乳汁滋养出来的乡土文学作家。农村有他的脚印和汗水,有他无尽的乡恋与乡愁,是他从事创作的出发地和灵魂的归宿处,他始终心念地表现冀中一带的农村生活。这包括一系列重大历史背景下的农村生活之流,都在大山的笔下做了艺术的梳理、有意味的提炼和真实的描写。

贾大山善于在生活中发现美与丑,重点表现美的人物和美的景物。他前期的作品如成名作《取经》,还有《劳姐》《赵三勤》《花市》《小果》等都表现了农村生活之美、农民心灵之美,纵然它们有时代留下的痕迹,也仍然能让我们看到人心中的真善美。从历史角度看,这些作品为我们保留了那个特定时代的生动信息。从1987年“梦庄记事”系列开始,贾大山的创作思路开阔起来。铁凝说:“他已把目光伸向了他所熟悉的底层民众灵魂的底层,于是他的故事便成了一个贾大山造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贾大山凭着自己下乡插队的生活积累,描写出农村日常生活中更为复杂的人性,“闪烁着乐观的心酸,优美的丑陋,诡谲的幽默,愚蠢的聪明,冥顽不化的思路和困苦中的温馨……”他这一时期的小说以《花生》《老路》等为标志,在精神层面和人性挖掘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贾大山写的都是地方性的中国故事,也表现了中国文化、中国精神。他的《中秋节》《拜年》《订婚》《离婚》和古城系列的《老底》等篇章突出地表现了冀中一带的中华传统文化之美,显现着他的文化底蕴,也证明他早就有文化的自信和自觉。

### 坚持运用现实主义的白描

贾大山是一个知识丰富、口才与文才双佳的业余作家,他是深居简出、长年蹲在正定却时时关注着社会现实的“秀才”。他也从来不把写小说看得太重,更不把写作变成“吓人唬唬”(铁凝语)的东西而自我标榜。在艺术理念上,他很有定力,始终在鲁迅的现实主义道路上孜孜探索。他不跟什么风,也不在什么派。还曾经自撰一联:“小径容我静,大路任人忙。”在20年的创作实践中,他始终如一地遵循运用了现实主义的白描手法,形成了他的小说艺术的突出风格。

写实求真。大山喜欢白描性的写实,从来不追求花哨和离奇,而是用生活化的朴素语言进行人物、场景和情节

的真实性描述。比如在《林掌柜》中,他就用沉实的笔调交代义和鞋庄在县城的位置、门面和设施,然后重点讲林掌柜那把精致的小剃刀。若有顾客对这里的鞋子质量有怀疑,他就用小剃刀把鞋侧成两截让人看,这便入木三分地刻画了林掌柜的诚信精神,也显示了作者表达的“实”。在一千余字的微型小说《老曹》中,大山轻松地叙述老曹到副食品厂去看大门,眼睛快瞎了百事不误,竟然年年得个奖状。退休后发挥早年特长,指导村民们做曹家元宵,和自己的副食品厂展开了竞争。这便是改革开放后农村市场上真切而寻常的一幕。

大山的故事都有现实生活的逻辑和生活自身的魅力,也都有现实的依据,并且多是人人心中有而个个笔下无。他的林掌柜和小剃刀、《取经》《喜丧》等都有人物原型或他的经历。大山用第一人称也较多,叙述得从容、平和而有味道,其真实感、亲历感强,可信度高、美感度也高。

简洁精当。大卫·米基斯说:“短篇小说就像一张快照”“都以简洁取胜……所有的一切都被浓缩,令读者难以忘怀”。贾大山深谙此理。他的作品,超过五千字者不多,一般都是三千字左右,他中后期的正定古城笔记体小说大多一两千字。无论稍长稍短,都不繁缛。雷达曾经说,贾大山一直在“磨砺”自己的白描功夫,难免有些单调,但对于他的“田园”、他的表现对象是“非常契合的,就如衣着简朴、样式合体、身材健美农家少女”。

大山总是用吝啬的态度、简明的语句精准地进行叙述描写,决不铺张,也不轻易议论、抒情,还善于运用大量对话表现人物个性、推动故事的演进。这在《离婚》《小果》《花市》等作品中表现明显。他像鲁迅、孙犁、汪曾祺、林斤澜等作家那样善于自我控制,挥毫而不泼墨。他的写作特点是,先把故事讲出来给人听才落到纸上,再压到褥子底下,经常隔着褥子想想,有需要修改的就拿出来改,这是一种沉淀,需要反复咬文嚼字。林斤澜在《初三说三声》中论说大山《枪声》的开头十几个字时写道:“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咬文嚼字不是雕虫小技。实际上雕不出雕来,是当不好作家的。”大山的简约,使大多篇幅一字不易,也给读者留下了想象和回味的余地,使得作品很有张力。

幽默风趣。大山本身不善交际,却又是一个“大活宝”、一个笑星。无论习近平还是徐光耀、林漫、铁凝、王力平、韩石山、尧山壁等都称道他平时的逗乐快乐和作品的幽默。在他的80多篇小说中,几乎每篇都有令人发笑的情节和细节。即使在《取经》这样严肃的事件和庄重的描写笔触中也有十几处幽默、诙谐和反讽,那些日常生活题材小说中的幽默情节和喜剧性对话等更不乏其例。所以他的小说体式可以称为日常生活体为主的幽默风趣体。贾大山在《老抽》中,叙述地名志干部老拙去省城参加一个文学座谈会,刊物主编一一介绍来者,因为他没有职务、职称,主编很亲切地说:“还有从县城赶来的好朋友老拙!”于是会场上爆发出一片笑声,使老拙内心很沮丧。回来后他发现许多出席人都是原厅长、原主编、原主席,一身的寒冷化出了一片暖意:啊,我那职称——“好朋友”的前面是永远不会加一个“原”字的吧。老拙就又转忧为喜了。由于炉火不旺身上发冷,他又给自己加了一句:“好朋友就是暖气!”这篇小说用幽默的笔法,轻松地道出了一个基层业余作者的心理变化。法国柏格森在谈喜剧时曾经说:“喜剧越是高级,与生活融合一致的倾向越明显。”幽默是笑的哲学,可以由外在的可笑表现内在的严肃甚至高尚。大山的幽默便是“高级”的喜剧手段。汪曾祺初到正定与贾大山交谈,就为他题词:“神似东方朔,家傍西柏坡。”用汉代东方朔这个半仙式人物比拟之。

有诗性节奏。古人说:惟造平淡难。大山在自己的简

历末尾真诚地写道:“我只想在熟悉的土地上,寻找一点天籁之声,自然之趣,以娱悦读者,充实自己。”后来也多次表达了这种创作理念。大山所写的中心事件都不复杂,乍看平平淡淡,纵有曲折也非波澜壮阔。细读之,就会发现它们是有节奏、有诗意、有色香味的。他的选材立意和词语运用,包括恰当的抒情、议论形成了他的抒情体式。这与作者有写戏曲和演出经历,以及爱好古典诗词、民间谚语都有很大关系。如《莲池老人》就是以题材本身的诗情画意和作者描述的节奏共同形成了优美深远意境的。

他的小说结构大多是单线条、三段式的。从人物出场、矛盾发展到结局,简短之中却又有着起承转合、抑扬张弛的节奏之美。比如《订婚》,是王氏弟兄两个都为对方成家着想,弟弟让兄长,兄嫂又宽待弟弟,小芬追树满,树满躲小芬,写得平淡而又起伏有致、变化自然。最后由“我”从中和合之,表现了当代农村博爱和谐的家庭人际关系,让人获得了人性美、亲情美的享受。

### 追求人物个性特征鲜明

一是注重人物肖像描写。大山经常简略地描写人物肖像,包括人物的长相、身形、穿着、言语声音。比如在《取经》中,他写李黑牛“小锉个,厚嘴唇”。在《老路》中,说老路“矮个子,黑胖子,说话没有标点符号”。在《花市》中,写卖花姑娘蒋小玉只用了“细眉细眼”四个字。而在《聋子》中描写聋子,则是“菜地的井台上……那人背向大家,像一块岩石,头上戴着一顶尖锥草帽,很破——那是聋子,种菜的聋子,只有聋子晚上也戴草帽”。这又是一种不露面容的肖像描写,特点是突出了他的破草帽。作者也描写人物的变化。如在《电表》中,内心别别扭扭的妯娌小桂、墨香不约而同地来找大嫂:“两人一见面,满脸的乌云像被一阵风吹散了,立刻变得笑嘻嘻的”。这些肖像描写,都与人物性格和情节发展紧密相关。

二是人物都有自己的性格。大山故事中的人物性格或刚或柔、或外在或内向,都是鲜明的,一般有两个或多个侧面及其不同的变化。在《干姐》《香菊嫂》《二姐》等作品中,大山正面塑造了多位青年女性形象。她们都心直口快、泼辣开朗,但细区分又各不相同。干姐于淑兰走路仰着脸,敢说“臊话”,但她发现“我”闹牙疼便来悉心照料,还讲拈花惹草的故事转移“我”的注意力。香菊嫂批评老好人丈夫时是“话头子似火鞭作响”,面对自私的吕巧娟却是不慌不忙,宣布对她的处理意见时又那么铿锵有力。她又厉害又讲究说话策略。“她每次进县城,都找‘我’和妹妹走后门买内部供应的短缺东西,对‘我’提要求时高声大嗓,回了村在邻里面前就很有优越感。但当她知道开始打击不正之风、处理不法官员后又害了怕。她最后一次找到‘我’就变得吞吞吐吐,‘我’追到城外她才悄悄地说了实话。她们是明代叶显评《水浒传》人物时所说的‘同而不同’。大山也用绰号表现人物的身份与性格。林老板用剃刀剃鞋子就得了个外号“剃刀林”;《西街三怪》中三位老人的外号分别是“药罐子”“火锅子”“神算子”,传神地表现了他们的个性与形象特点。

总之,贾大山的创作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美的传统,发挥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优长,表现出了他的美学修养、美学精神和审美表达技巧,形成新时期以来我国短篇小说创作上的一座高山。雷达总结贾大山的创作是“山药蛋派”又是“荷花淀派”。孙犁赞美贾大山的小说,像农民自食自用的“棒子面”那样“难得”,“他的作品是一方净土,未受污染的生活反映,也是作家一片慈悲之心向他的善男信女们施洒甘霖”,还诙谐地说:“小说爱读贾大山,平淡之中见奇观。可惜作品发表少,一年只见五六篇!”虽然大山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小说集几次出版,石家庄市开设了“贾大山文学奖”,正定县为贾大山雕塑了铜像,在他曾经插队的西慈亭村建起了贾大山旧居纪念馆。他的弟子康志刚等也在学习和研究贾大山小说中不断进行艺术创新。这是贾大山精神、贾大山小说创作艺术的延续和发展。

## ■新知新思

## 写黄河的黄河口人

——张中海《黄河传》的创作轨迹 □马恒祥

古往今来,数不尽的文人骚客为黄河这条炎黄子孙的母亲河,挥洒了太多的浓墨重彩。今日捧读张中海的《黄河传》(山东人民出版社),忍不住有话要说。

张中海出身于农民,但不甘困于黄土地的一隅。在当了12年民办教师后,于1985年转正调入临朐县师范任教。也是这一年,文学评论家、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宋遂良慧眼识才,举荐张中海到淄博师专中文系任教。赴淄博同师专的领导接洽后,他在返回临朐的火车站广场上遇见了几辆开往胜利油田的运兵车,便大着胆子与士兵们搭讪了几句,就随车去了胜利油田,直奔好友、诗人丁庆友而去。丁庆友建议他到东营市文化局从事专业文学创作。1988年3月,张中海成为黄河三角洲这片新淤地上的一员。

大荒原、大油田、大河、大海……这样一片崭新的土地,慷慨地接纳了这位来自沂蒙山区的庄户汉子。那么,张中海又该给这条母亲河怎样的回报呢?

张中海调东营后,第一时间写信告诉了我这个消息。因为我是他第一首诗作正式发表的责任编辑。那是1978年夏天,我以《山东文学》诗歌编辑的身份到昌潍地区诗歌学习班讲课,看中了张中海的一首诗,回省城后就选编发表了。此后,他的第一个和第二个组诗也是我在1980年1月和12月以破格待遇推出的,远在他在《诗刊》《星星》《萌芽》等刊物发表作品之前。而张中海的第一组短篇小说,也是我主持《山东文学》工作时在1986年1月号上发表。对于他文学创作的成绩,我由衷感到高兴。

1995年,我去东营干干,张中海刚完成《一条大河与一条大河归宿》5万字的黄河口写作,并且已确定在《大众日报》连载发表。他说:“我写的是黄河入海的三角洲,是黄河的尾,也是黄河书写刚开的头,下一步就写全河,感觉自己能为母亲河写一部很好的大书。下一步,关键是一步一步把母亲河走完。”当时有的三角洲作家已到黄河上转了几圈,也写出了反映黄河的作品,张中海却迟迟不见行动。

一个原因是,《大众日报》刊发《一条大河与一条大河归宿》过程中,报社希望他到报社工作。这当然不是张中海的初衷。一方面个人的梦想还想继续下去,另一方面报社这边又感情难却,在这种情况下,中海只能屈从“借调”,没想到一“借”就是五年。到2000年,他成为省报记者、编辑中的一员。这是张中海职业生涯中的第三次变

化。他当时和东营市委原书记、后任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的李殿魁相约一起走黄河的诺言没能实现。《一条大河与一条大河归宿》由文章到书,在近20年之后的2013年才完成。总之,他离黄河越来越远了。

2005年5月,山东黄河河务局派人到省作协,希望省作协推荐一位作家,为人民治理黄河60周年创作一部作品。我与党组书记卢得志(曾任东营市委宣传部部长)共同推荐了张中海。他不负所望,与丁庆友合作推出了《一条大河与一条大河的子孙》,似是之前《一条大河与一条大河的归宿》的姊妹篇。正是在此次深入的采访写作中,《黄河传》的结构形成了;也是在此期间,他在侯全亮所著的《天生一条黄河》中看到了这位资深文化专家的呼吁:“希望中国有一部真正的《黄河传》!”这样,间隔10年后,《黄河传》一书的初稿在完成河尾后,山东部分便有了一个雏形。

2007年春,我从山东省作协退休,应张中海之邀,来他所在的一个部门协助做些编务工作。做编辑是我的老本行,轻车熟路。在这里我和张中海合作共事了6年,相互间有了更多了解。我看见他写黄河的梦想虽然没有时间实施,但在紧张工作之余默默做着资料准备,就把家里一些与河有关的资料和参考书搬给了中海。2010年报社欲改制,似乎可以如他所愿,提前退休开始中断20年的写作了。在另一个重大题材和黄河这两个题材之间,他为到底先写哪个好而犹豫不决。我理所当然地建议他先写黄河。

张中海决心写黄河的最初冲动,是他进入三角洲后所发现愈演愈烈的黄河的断流。那一年他写《一条大河与一条大河的归宿》时,正是人民治理黄河50周年。而那时,黄河已经200天没有了涓流,整个三角洲都处于焦虑中。进入1997年,黄河三角洲断流已经超过300多天。最甚时,上溯到开封市陈桥,河水干涸已达700多公里。就在中海以《一条大河与一条大河的归宿》振臂一呼,并誓言为母亲河树碑立传而日积月累之际,1998年,163位院士联名呼吁“拯救黄河”。2000年开始调水调沙后,黄河已20年不断流;近年来,黄河又以汹涌的流量,把多年不见的洪峰从潼关推至入海口。由河下游的断流想到全河忧患,由三角洲一隅延及整个神州,由一条大河的命运想到民族灵魂……作品晚了20年出炉也仍然新鲜如初,只因源于作者扎根生活、扎根时代。

## ■开卷絮语



“我与一座城”是《人民日报》大地副刊的一个著名专栏,我也曾为这个专栏撰写过一篇文章。但当看到人民日报出版社推出的《我与一座城》这本书时,还是大为惊讶,觉得这个栏目的创意简直太绝妙了。该栏目邀请了不少作家撰写自己与一座城市的故事,绝大部分作家写的都是自己与家乡城市之间的关系。因为有切身的体验、深厚的情感,所以每位作家都有话要说,都有真情实感,在他们笔下写出了数十年间自己的成长与家乡城市的变化,而一座城与一座城相连,汇聚成一本书,我们就可以看到祖国各地的城市,可以看到一个整体性的“中国故事”。这个创意的切口虽然很小,也容易让作家入手,但其背后却有着宏大的视野和追求。

收集在《我与一座城》这本书中的文章共70多篇,所写的城市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既有天津、石家庄、南京、邢台、大同、济南等华北城市,也有满洲里、大连、长春、哈尔滨等东北城市,还有扬州、杭州、宁波、绍兴、芜湖等江南城市,以及襄阳、长沙、广州、梧州、成都、南昌、瑞金、遵义等南方城

## 我们心中的城市与「中国故事」

——读《我与一座城》

李云雷

市,兰州、延安、西宁、伊犁等西北城市。其中既有历史文化名城,也有革命老区城市,既有直辖市,也有地级市和县级市,构成了一幅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中国城市版图。无论哪个城市,都深深融入了作者的生命之中,因而焕发出独特的光彩。文章作者的构成也多种多样,既有文坛名家,也有初出茅庐的新人,既有小说家、散文家、评论家,也有儿童文学作家、文史研究者、地方文化名人。他们在讲述城市的故事,也是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以独特的生命体验讲述了城市的过去和现在,也在憧憬着更美好的未来,谱写了一曲人生与城市交相辉映的交响乐。

读《我与一座城》,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城市发展的迅猛快速。在不少篇章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作者早年的城市记忆是破旧狭窄凌乱的,但等十几二十年回来,城市的面貌已焕然一新,原先熟悉的生活场景已经无法辨识,甚至标志性的建筑都已经消失了,只有在路人的指点下才能回到原先生活的旧址。比如在《那台的桥》中,刘江滨写到,“掂起脚跟儿往院子里瞧去,原来的房屋楼舍都不见了踪影。跟老前辈打电话才知道,这块地方已经整体拆迁,正准备盖新楼盘呢。”比如在《青春伴作》中,刘大先写到,“十几年后,我被母校邀请给新报到的学弟学妹做讲演,发现自己在这座曾经熟悉无比的城市已经不辨东西。”令人惊奇的不仅是城市的变化,而是城市变得越来越现代化,越来越美好宜居,“也不知从何时起,‘绿’开始在大同萌动了”,“城门也都建好了,护城河水流淌起来了,青砖碧瓦,角楼林立,古色古香,与周边的带状公园相得益彰,浑然一体”(常占库《美丽的大同》),“进入21世纪不久,绵延梧州城区近二十公里的防洪堤建成,将水被牢牢框定在堤坝下,洪水漫

街的景象已成为记忆。那些为了‘招待’洪水而建的骑楼,现在变成了‘骑楼城’的观光景点”(黄咏梅《在梧州看水》),“转眼间,我也可以以一个老西宁人自居了,眼看着这座城市一点点地成为一座绿色宜居的城市”(龙仁青《西宁的丁香》)。而革命老区的最新变化尤其让人感到欣喜,“这些年,退耕还林稳步推进,延安的天更蓝了,山更绿了,城市也变得更美了。每年夏天,延安城四周的群山满目苍翠,空气凉爽宜人”(厚夫《延安新貌》),“数十年前,父亲带我看遵义。当我到父亲的年纪时,我陪父亲看遵义。如今,乡村振兴的朝霞已经悄然映红了遵义的山河大地”(肖岗《光荣的城市信仰的力量》)。以上所举的只是几个例子,但我们可以看到,时代在发展,中国在城市,中国的城市也在迅速发展,这是一个整体性的变化,也是具有时代特色的“中国故事”。

对于当代文学的发展来说,“我与一座城”的书写也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有悠久的农耕文明和成熟的“乡土文学”的传统,不少作家已经离开乡村在城市定居数十年,但下笔所写的依然是乡村,乡村的熟人社会和审美习惯是我们所熟悉的,几乎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在审美领域我们还未将城市生活真正纳入表现的范畴,这是应该勇于突破与尝试的。然而另一方面,不少倡导城市文学的人往往套用19、20世纪西方文学的城市经验,强调都市感、现代感和节奏感,强调西方现代派或新感觉派的表现方式与技巧。但中国的城市经验与西方的城市经验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我们不应简单模仿其形式,而应立足于中国城市及其发展变化的生活经验之上,发展出一种新颖独特的中国都市美学,这是我们应努力探索的方向。“我与一座城”让众多作家以散文的形式,自然从容地书写自己独特的城市经验,这是对作家城市经验的唤醒,也是对中国独特城市经验的展示。这在我们加速推进城镇化的今天,在“乡土中国”正在转变为“城镇中国”的历史性时刻,尤其具有重要的历史与文学价值。